

现代大学校长文丛

朱清时 主 编
李传玺 执行主编

傅斯年

卷

唐元明 编

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现代大学校长文丛·傅斯年卷 / 唐元明编.
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15
ISBN 978-7-5336-8110-4

I. ①现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高等教育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G649.2—53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0911 号

现代大学校长文丛·傅斯年卷

XIANDAI DAXUE XIAOZHANG WENCONG FU SINIAN JUAN

出 版 人:郑 可
质量总监:张丹飞
策划统筹:王 骏 钱 江
责任编辑:朱 矾
装帧设计:阮 娟
技术编辑:王 琳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
地 址: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:230601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营销电话:(0551)63683011,63683013
排 版: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20×960 1/16
印 张:21
字 数:310 千字
版 次: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3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总 序

一

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一个日子。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八月初六,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,戊戌变法失败了。一边是慈禧再度“训政”,一边是废黜光绪,废除新政,对倡导变法维新人士进行大搜捕、大屠杀。其中独有一项“成果”经过一个老人的巧妙运作保留了下来,那人是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,那“成果”便是京师大学堂。

也许是经过变法者心血与鲜血的滋润,这粒中国现代教育的种子开始了它的倔强生长。

至1949年,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包括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它的格局、架构已基本形成。

由此,人们常常发问:

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时期,朝代更迭,袁氏复辟,走马灯式的北洋政府;军阀割据,连年混战,人民水深火热几不聊生;外敌入侵,十四年抗战,虽取得胜利,接踵的又是国共内战。如此时空背景,常常使课堂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,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能够生长,且健全了各门类基础学科,诞生了一批名校,培养出了惠及后世的大量杰出人才,在教学相长过程中走出了大批大师

级的教育家、科学家、思想家。为什么？

钱学森先生曾这样发问。

每个人一说到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时，总会想到蔡元培先生，总会想到西南联大，更会这样发问。

二

2010年3月14日下午，首都机场。全国两会结束，各地的政协委员返程。全国政协委员，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，时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正坐在过道边的椅子上。那段时间，他是热门人物，一直被媒体包围着，此刻他好像很累很疲倦，但仍有记者不停地同他说着教育的热点话题。作为安徽政协委员向中央报送信息的联络员李传玺也站在旁边听，并不时对朱清时先生切中肯綮的评论报以由衷的赞美。

“你是哪家报社的？”朱校长问李传玺。

《江淮时报》副总编常河先生站在旁边，向朱校长介绍了李。

“噢，你研究胡适啊，我对30年代那批大师，尤其是那批大师级的教育家非常佩服。”

这句话也埋下了一粒种子。

2012年初，时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就职的王骏先生询问李传玺，今年有没有好的选题。

李传玺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在首都机场与朱清时校长谈话的画面，以及朱先生最后的那句话。何不请朱清时先生担纲编选一套现代大学校长文丛？王骏向社领导做了汇报，很快得到了同意。可朱清时校长能同意么？初春的一个下午，李传玺拨通了朱清时校长的电话，虽然天气不热，却紧张得一手心汗。没想到朱校长听完了介绍后，欣然同意。

于是有了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书。

让我们倾听一下那些大师们的声音。声音都不是那种激昂慷慨式的，很平和，却更入灵魂。

蔡元培先生：“对于各家学说，依各国大学通例，循思想自由原则，兼容并包。无论何种学派，苟其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，即使彼此相反，也听他们自由发展。”

张伯苓先生：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，“允公是大公，而不是小公，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，算不得什么公了。惟其允公，才能高瞻远瞩，正己教人，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，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”，“允能者，是要做到最能，要建设现代化国家，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……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，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”。

蒋梦麟先生：“大学者，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”，“学校之惟一生命在学术事业”，“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，则真理不明”，“畀以学术自由之权，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，不受外力阻挠也”。

梅贻琦先生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“新民之大业，非旦夕可期也，既非旦夕可期，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，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，其所以自处之地位，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；其注意之所集中，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；其所期望之成就，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。”

胡适先生：“学术的发达，人才是第一要件。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，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，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，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和工作人员”，“只有在自由独立原则之下，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”，“‘自由’是学校给予师生的，‘独立’则为创造的”。

竺可桢先生：“科学精神就是求真，要‘只问是非，不计利害’。这就是说，只求真理，不管个人的利害”，“求是的路径，《中庸》说得最好，就是‘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’。单是博学、审问还不

够,必须审思熟虑,自出心裁,独著只眼,来研辨是非得失”。

.....

不需要再引了,读着这些话,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,也许自会得出本文开篇所提疑问的答案。即使不是,你也会强烈感受到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教育胸怀。此书还选收了大量大师们其他方面的论文甚至美文,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充分领略到大师们多面的风采。

李传玺

2015年3月

目 录

导 读

- 1 亦儒亦侠的傅斯年 唐元明

第一辑 教育类

- 13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
18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
23 再谈几件教育问题
29 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
33 论学校读经
38 闲谈历史教科书
48 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
56 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
68 “国立”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
72 台湾大学国文选拟议
76 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

目
录

1

第二辑 时论类

- 111 文学革新申义
121 《新潮》发刊旨趣书
125 汪贼与倭寇——一个心理的分解
131 盛世危言

- 137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
143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
149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

第三辑 史学类

- 163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
172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
179 史学方法导论
218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——一个短记
222 明成祖生母记疑
232 夷夏东西说
279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
305 故书新评
321 出版界评

亦儒亦侠的傅斯年

唐元明

傅斯年(1896—1950),字孟真,山东聊城人。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。6岁入私塾,10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,11岁读完《十三经》。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。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、毛子水等组织新潮社,负责编辑《新潮》月刊,影响很大。同时发表《文学革新申义》等力作,响应胡适的名文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倡导白话文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期间,为学生领袖之一。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,先后入英国爱丁堡大学、伦敦大学,研究实验心理学、物理、化学和高等数学。192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,学习比较语言学等。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,1927年任该校教授、文学院院长,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,同年在中大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,任所长。1928年受蔡元培之聘,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。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,讲授“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”及“中国古代文学史”。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所长、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、中央研究院总干事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、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。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

长。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突发辞世。

在傅斯年短短55年人生中,少年英姿、壮怀激烈,时代弄潮、书斋学者,教书育人、参政议政,多重角色集于一身,各个方面都很杰出;同时,他还是有名的“大炮”“老虎”“诤友”等。借用乃师亦友胡适的评价是:“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。他的记忆力最强,理解力也最强。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,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。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者,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、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。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,往往带有爆炸性的;同时,他又是最温柔、最富于理智、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。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,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。”(《傅孟真先生遗集》序)傅斯年的学友罗家伦也曾这样称道他:“孟真贫于财,而富于书,富于学,富于思想,富于感情,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。”虽都有爱惜和褒扬的成分,但确是持重之论、知音之辞,说出了傅斯年富于学、精于业、激于义、尚于德的才情与操守,他身上也折射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诸多光彩照人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精神。

“五四”先锋

在北大求学期间,傅斯年受到蔡元培、胡适、陈独秀等时彦影响很大,钟情新学,思想自由,崭露头角。1918年,他与同学罗家伦等创建新潮社,出版《新潮》月刊,担任主任编辑,很快吸引了顾颉刚、冯友兰、俞平伯、朱自清、康白情、江绍原、张申府、高君宇、谭平山等一批优秀作者,佳文迭出,关注度高。虽然《新潮》的政治色彩不如《新青年》那么强烈,但其坚决主张民主自由、民族独立、男女平等、社会清明,并以科学的方法和理性的态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价值,反对一切保守、迷信与盲从,二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。因而学界普遍认为,在新文化运动中,《新潮》是仅次于《新青年》的重要刊物。就连胡适也情不自禁地在《中国文艺复兴运动》一文中称誉:“《新潮》杂志,在内容和见解方面,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《新青年》还成熟得多,内容也丰富得多,见

解也成熟得多。”此说虽有对《新青年》后来办刊思路激变的不满，但也确实反映了《新潮》在当时的重要影响。同时，傅斯年从1918年1月发表《文学革新申义》起，先后在《新潮》《新青年》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等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近70篇，响应文学革命，倡导自由思想，批判保守文化，评鹭社会问题，引起广泛瞩目。他还身体力行，积极参与组织了“五四”运动，自己曾回忆说：“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，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，打进曹汝霖的住宅。”确实起到了北大游行队伍总指挥的作用，可谓影响深远，彪炳史册。1945年7月，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，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，并当面称赞他在“五四”运动中的贡献。他却答道：“我们不过是陈胜、吴广，你们才是项羽、刘邦。”临行时，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：“不将寸土分诸子，刘项原来是匹夫。”可谓意味深长。

学者本色

傅斯年出生于名门世家，先祖傅以渐系清王朝开国状元，后代代诗书传家。他幼承庭训，打下了深厚的文史功底。1919年冬出国，先后在英国、德国留学7年，所学多属自然科学，也兼及语言学等。虽然没进修历史学课程，但他读书很博，哲学与历史自然要涉及，其“史料即史学”的思想就是受当时风行德国的兰克学派所影响。尤为重要的是，他掌握了西方的科学理论与治学方法。正如罗家伦所言：“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，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，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。”蒋梦麟也说：“孟真博古通今，求知兴趣广阔，故他于抒发议论的时候，如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。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，溯源别流，剖析因果，所以他的结论，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，能道人之所不能道。他对于研究学问，也用同一方法，故以学识而论，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。”（《忆孟真》）的确，20世纪初年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中，真正影响大而见识高的并不多，傅斯年当属其中佼佼者。

傅斯年有两句学术名言，一句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

西”，强调现场考察和实证资料的重要性；另一句是“史学即史料学”，强调“一分材料出一分货，十分材料出十分货，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”。这些观点和原则虽不乏重要意义，却也引起过争议。学界推崇傅斯年在学术上、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上的创新之举，乃是推动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及现代化，以符合西方科学标准的研究来拓展学术新境。特别是利用反复实验，考证和确定客观规律与事实；用自然科学心态看待历史，让史学成为历史科学；以新工具引出新问题，检验旧材料，创造新的研究领域与材料，让史料研究、搜寻、佐证成为学术研究核心。同时，他又强调，史料学考订史料的真伪、史料记载的准确性、史料写定的时代等等，但这还不是整个历史学，历史学的涵义应更宽广，而且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史迹，反映出它真实的本来的面目。这些理论观点与不断实践铺就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之路，从而创立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上重要的史料学派，傅斯年居功甚伟。

傅斯年创造性地提出，历史可以“断世”而不必“断代”，坚持“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”以“断世”，并形成了建构明晰的“断世”体系。他强调，须以“种族与文化”作为治史的核心，而且“种族”也多归因于“文化”。他在《中国通史纲要》（北大授课讲义）中，明确提出“以‘民族迁动’为中国史分期之标准”。在《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》一文中又主张：“研究一国历史，不得不先辨其种族。诚以历史一物，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。种族有其种族性，或曰种族色者（Racial colour），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。种族一经变化，历史必顿然改观。”他强调：“中国历史上所谓‘诸夏’、‘汉族’者，虽自黄、唐以来，立名无异；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，无代不有……自陈以上，为‘第一中国’，纯粹汉族之中国也；自隋至宋亡，为‘第二中国’，汉族为胡人所挟，变其精神，别成统系，不蒙前代者也。”在1931年给陈寅恪的信中，他再次重申：“中国之国体，一造于秦，二造于隋，三造于元。汉承秦绪、唐完隋业，宋又为唐之清白化，而明、清两代，虽民族不同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。”同时，傅斯年也注意到历代“政俗大有改易，不可不别作‘枝分’”，即上世为“政治变迁”，中世为“风俗改易”，近世为“种族代替”。

傅斯年的史学代表作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是一部体大思精的中国史专著,可惜生前只完成三分之二的内容。《夷夏东西说》和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等名篇皆是该书的章节。《性命古训辨证》《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》《史学方法导论》《东北史纲》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》等也属系统、厚重之作。这些论著多有精义和创见,不少是“有突破性、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”(何兹全)。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曾称赞的那样:“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,是无疑的。他的《夷夏东西说》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。这篇文章以前,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……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,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……有了这篇文章以后,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不同的角度。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突破性的。”“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。”

傅斯年不仅有学术雄心,更富有学术事业心。他学识渊博,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,在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、对殷墟的发掘研究等重大工作方面,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1928年,他负责创办中研院史语所,并担任所长23年之久,培养了大批历史、语言、考古、人类学等专门人才,如李济、董作宾、丁声树、劳幹、胡厚宣、夏鼐、周一良、全汉升、邓广铭、张政烺、严耕望等。组织出版学术著作上百种,影响深远。1928—1937年,傅斯年排除阻力,组织专家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,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,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,在抗战前非常时期,他组织抢救、整理清朝内阁大库中8千麻袋总计15万斤的明清档案,都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,并争取到史语所进行专门整理,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考古学家李济曾赞叹说:“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,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,有一套完整的蓝图,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,按部就班,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。困难总是有的,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,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,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。”可以说,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,傅斯年是第一功

臣,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有着重大贡献。

北大“功狗”

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,不仅是北京大学的重要领导人,而且是台湾大学的勋臣。从早年进入北大读书开始,他就一直献身大学、休戚与共,先后出任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及西南联大教授、校务委员,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。他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,在学术上和行政管理上都能应对自如,令上下称道。在1929至1948年间,他几乎一直兼任北大(包括西南联大)教授,积极出谋划策,做了很多校务管理工作。多年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深情地说:“‘九一八’事变后,北平正在多事之秋,我的参谋就是适之、孟真两位,事无大小,都就商于两位。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,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,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。”抗战胜利后,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,在胡到任前的一年间(1945年8月至1946年8月)傅任代理校长,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,如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、校产,对伪北大教职员处置等。他以“汉贼不两立”的态度,毅然决定对周作人等附逆人员一个不用,“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”,为迎胡适回校铺平了道路。他在写给夫人余大綵的信中曾直接表露过心迹:“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,胡先生办远不如我,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,他好办下去。”因此,他曾自诩为胡适的“清道夫”“保驾人”,并对蒋梦麟说,蔡元培、胡适是北大“功臣”,北大精神的创始者;而他与蒋梦麟只不过是北大“功狗”。这种勇于献身、甘作绿叶的高尚精神,着实可歌可泣。

1949年1月,傅斯年在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人力劝下,赴台就任台湾大学校长。他以“埋骨于田横之岛”的决心,筚路蓝缕,全力以赴,用极短的时间就把混乱不堪的台大整顿引导进入正轨,并建立起长远制度及良好校风,形成教育及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传统。学人李东华曾称道说:“台大校史上,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,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,恐无人能出其右。”(《功勋尽瘁,死而后已——傅斯年先生在台

国士无双

傅斯年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，满腔热血、仗义直言、勇往直前是其个性。罗家伦曾以“纵横天岸马，俊奇人中龙”来形容他的秉性与才气，在《元气淋漓的傅孟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，则与伏台尔(Voltare)相似。他们都愿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。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，而且爱打抱不平，也是相似之处。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，而孟真则坦白率真。”1932至1937年，他和胡适等师友以“书生报国”的情怀，捐资出版《独立评论》周刊，评论时事百态，发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正义呐喊争胜，发表了《东北史纲》《日寇与热河平津》《政府与对日外交》《中华民族是整个的》《北局危言》《汪贼与倭寇》等一系列文章，抨击绥靖卖国政策，提出抗日救亡主张，激发知识界及全社会的爱国精神。

“百士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”。傅斯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是将两位显赫一时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。孔、宋先后担任行政院长，长期掌管国库钥匙，贪污腐败，发国难财，使民怨沸腾。嫉恶如仇的傅斯年，拍案而起，说：“我拥护政府，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，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，才能真正帮助政府。”他带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案，并在影响很大的《大公报》上连发檄文，敦促“这个样子的”孔祥熙、宋子文“非走开不可”，朝野震惊，两人先后被迫下台。毛子水盛赞他“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”。蒋廷黻也称道他的论政之作“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”，深切独到，烛照幽暗。的确，他正气凛然，眼光犀利，笔力千钧，所向披靡，因而赢得“傅大炮”的美誉。

傅斯年对邪恶势力总是表现出金刚怒目、不共戴天的一面，而对待师友与弱势群体又往往体现出尊重、宽容与温煦的一面。1932年10月，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。虽然两人政见有异，但他在《独立评

论》发表《陈独秀案》一文，热情地称颂陈独秀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，赞美他是“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”。胡适也曾说：“有人攻击我，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，说：‘你们不配骂胡适之。’”他确实甘于冲锋在前，尽力顾惜时贤。他为无数教师学生等提供过帮助，如在西南联大期间，他想方设法关心陈寅恪等名家的生活与健康，也为林徽音等知识精英的工作与身体费心筹措。他曾对胡适说，“既为读书人，则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”，就应“无惭于前贤典型”。

傅斯年一生不党、不宦。虽有多次仕途机遇，但他始终不为所动，不愿从政，而愿意参政议政。他曾说：“我们是要奋斗的，惟其如此，应永久在野，盖一入政府，无法奋斗也。”并表明态度：“与其入政府，不如组党；与其组党，不如办报。”傅斯年始终关注政治、心系社会，却能抱守名节，廉洁奉公，不谋私利。林徽音、梁思成称誉其“存天下之义，而无有循私”，信哉斯言。

本书精选傅斯年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重要章节、论文、时评、书信 28 篇，涵盖教育、政论、史学、文学及学术方法等若干方面。教育类 12 篇，涉及教育改革、大中小学定位与重点、教师选择与教材建设、教学与研究的关系、中国学校制度历史与现状考察等，体现了其教育兴国、教育独立、教育机会平等核心思想观念。特别是维护学校与学术自由，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，严格挑选校长和教师、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，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等主要教育观点，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时论类 7 篇，既有作者写于 1918 年的思想发轫之作《文学革新申义》和有名的《〈新潮〉发刊旨趣书》，也有《汪贼与倭寇》《盛世危言》等抗战中救亡图存的急切呼吁，以及抨击豪门巨族祸国殃民的正义之声，展示了傅斯年作为时代先驱、民族栋梁在社会变局和危难中的智慧、勇毅与担当。史学等方面 9 篇，选录了作者较早提出其史学观与办所方针的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》，系统阐述史料发掘、鉴定与应用方法的《史学方法导论》，开辟中国历史研究重大系统观念的《夷夏东西说》，显示辨疑文献、考

证史实缜密善断功力的《明成祖生母记疑》，论证古代文体演进轨迹与模式的精辟之作《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》，长篇学术通信《与顾颉刚论古史书》，以及学术书评《故书新评》《出版界评》等，反映了作者作为现代史学大家、重要学术机构掌门人，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的独特见解，在学术思想、治学方法上的精深造诣。全书兼顾了作者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长篇学术论著，体现先进教育思想理念与成功教学实践的重头文章，总结学术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指津之文，以及影响社会风气的政论、洋溢作者个性风采的时评等，从若干方面突出展现了作者的学者本色、教育家风范和社会活动家的卓越贡献。